

MINGUO
SHIJI
YUYAN ZHENGCE YANJIU

民国时期 语言政策研究

黄晓蕾◆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MINGUO
SHIQI
YUYAN ZHENGCE YANJIU

民国时期
语言政策研究

黄晓蕾◆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语言政策研究/黄晓蕾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 - 7 - 5161 - 2901 - 2

I. ①民… II. ①黄… III. ①语言政策—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H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840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孔 晓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283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

——荀子《正名篇》

魏著作谓法言曰：“向来论难，疑处悉尽，何为不随口记之，我辈数人，定则定矣。”

——陆法言《切韵序》

撰写一部中国语言规划史

黄晓蕾的《民国时期语言政策研究》，是她博士论文的升级版。从2002年读博时渐入此域，到2005年完成博士论文，再到今日修改成书，前后十年矣！十年中，不管是生理想家，还是更换单位、承担新务，皆能就一个课题持续钻研，磨剑不辍，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学术定力、学术韧性，是一名真学者应具有的学术素质，或者是学术品质。

民国时期于今不远，但是语言规划的素材并不易得。当年晓蕾作博士论文，以及之后完善论文，她都耐心收集材料，细心观察材料，精心编织材料。不急躁也不浮躁，“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是一个真学者应具有的学术心态，甚至是学术境界。

晓蕾这部书，全面描绘了民国时期的语言政策，记述了此期重要的语文思潮、语文团体、语文人物和语文事件，且在关注语音、文字等本体规划内容时，还涉及术语、新词、语体等。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语言规划，始自清末之切音字运动，至今已百年有余。百余年来，语言规划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正因其一脉相承，所以研究民国时期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不仅可以科学评价清末语文运动的历史影响，也有助于理解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的语言政策。民国时期的语言规划，也影响了中国台湾、香港和海外诸多华人社区，因而海内外华语读音标准一致，文体皆以白话文为正，且共有注音或拼音工具。研究民国时期的语言规划，自然也有助于了解海内外华人社区的语言今貌，把握其发展走向。晓蕾以其十年之力研究民国时期的语言政策，其功既在中国语言规划史，亦涉及当代各华人社区的语言生活。

语言规划作为一门现代学问，若从1959年美国语言学家豪根（E.

Haugen) 提出语言规划的概念算起, 仅有短短五十多年, 但是人类的语言规划实践却有着悠久的历史。五十多年的语言规划学研究, 侧重于研究现代, 而较少关注历史, 这无疑是一种缺憾。

中国不仅是文明古国, 也是世界上最早规划语言文字的国度之一。如先秦之“倡雅言”、“重正名”, 秦朝之“书同文”, 汉末之“熹平石经”, 唐代之“字样之学”等, 都是重要的语言规划; 历代之官修韵书字典、设学兴教、科举取士, 都是推行语言政策的有效举措; 在经学大师的论著里, 在语文典籍的序跋中, 常有语言规划之论。不过, 这一领域的材料收集不全, 研究不多, 其研究标高大约应是李建国先生之《汉语规范史略》。

中国是治史大国, 治史者众, 但治语言学史者寡。中国语言学史研究, 只是到了这个世纪之交才突然发热, 但关注中国语言规划史者, 仍是寂寂寥寥。而中国几千年语言规划的实践与学说, 相信是支撑语言规划学不可缺失的科学材料。我多年来不间断地研究切音字运动, 并对诸子百家有关语言的论述保持着兴趣。我的两名博士生高晓芳、孙春颖, 分别把晚清外语教学、明代语言规划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国家语委也曾设立“中国语言规划的历史研究”项目。但这些研究, 距离写一部厚重的中国语言规划史, 还有遥遥之路。

中国语言规划史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 需从搜集材料做起, 需从断代研究做起。以史料作基础, 纵串为史, 抽象为论, 方能建立起中国的语言规划学说。参之以方国的事实与理论, 进而升华出普世之果。当前, 世界语言生活面临重大变化, 显现出一系列新特点, 产生着一个个新问题。如此形势, 呼吁着世界领域的语言规划。世界语言规划, 可以从中国的历史里, 从中国的学人处获得借鉴。

当今之世, 当今之学, 需要一部中国语言规划史。

李宇明

2013年4月20日

序于北京俱闲聊斋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语文运动”和“文字改革”vs. “语言政策”和 “语言规划”	(2)
一 “语文运动”和“文字改革”	(2)
二 “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3)
三 本书使用的“语言政策”概念	(8)
第二节 民国时期语言政策的相关研究	(10)
一 20 世纪 20—40 年代的语言政策	(11)
二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语言政策	(18)
三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的语言政策	(20)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方法和框架结构	(24)
第二章 历史背景	
——清末语言文字运动	(26)
第一节 切音字运动中的三大方案	(26)
一 卢懋章与《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	(27)
二 王照与《官话合声字母》	(28)
三 劳乃宣与《简字全谱》	(30)
四 切音字运动的历史意义	(32)
第二节 吴稚晖、章炳麟关于万国新语的论争	(35)
一 吴稚晖的《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	(36)
二 章炳麟的《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	(37)
三 吴稚晖的《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	(38)

四 评 述	(39)
第三节 清末的科学名词翻译	(41)
一 经世派官员时期	(41)
二 洋务运动时期	(42)
三 戊戌变法时期	(44)
四 清廷对于切音字运动和科学名词翻译的态度	(51)
 第三章 北洋政府前期	
——读音统一会、中华国语研究会和医学名词审查会	(53)
第一节 读音统一会	(53)
一 机构成立	(54)
二 核定国音、议定字母	(55)
三 国音推行方法	(56)
四 评 述	(57)
第二节 中华国语研究会	(58)
一 机构成立	(59)
二 与教育界联合促进注音字母的公布	(60)
三 公布《国音字典》初印本	(62)
四 评 述	(64)
第三节 医学名词审查会	(64)
一 历史背景	(65)
二 机构成立和三次会议	(65)
三 评 述	(68)
第四节 译名大讨论	(69)
一 章士钊引发的译名讨论	(70)
二 胡以鲁的《论译名》	(77)
三 评 述	(81)
 第四章 北洋政府后期	
——国语统一筹备会和科学名词审查会	(83)
第一节 “五四”前后关于拼音文字和国语文学的论战	(83)

一 《新青年》、《国语月刊》关于拼音文字的论战	(84)
二 《新青年》关于国语文学的论战	(94)
第二节 国语统一筹备会	(100)
一 机构成立	(100)
二 《校改国音字典》和京国问题	(102)
三 国罗字母、汉字省体和注音字母	(106)
四 小学校国文科改国语科	(114)
五 国语教育的推行	(122)
六 左行横迤和标点符号	(126)
七 《国语周刊》和国语运动大会	(129)
第三节 科学名词审查会和译名的继续讨论	(130)
一 科学名词审查会	(131)
二 译名的继续讨论	(134)

第五章 国民政府前期

——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和国立编译馆	(137)
第一节 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	(137)
一 机构成立	(139)
二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工作	(141)
三 《国音常用字汇》	(143)
四 国音字母两式	(148)
五 简体字和注音汉字	(158)
六 “小学国语科暂行课程标准”和“小学国语课程标准”	(162)
七 政府公文	(163)
第二节 国立编译馆(上)	(168)
一 机构成立和机制运行	(168)
二 人文社会科学名词的审定和统一	(170)
三 地名人名音译标准原则草案	(175)
四 评 述	(177)
第三节 百科、专科辞典	(179)
一 历史背景	(179)

二 20 世纪 30 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几部百科、专科辞典	(182)
三 评 述	(187)

第六章 国民政府后期

——国语推行委员会和国立编译馆	(189)
第一节 国语推行委员会	(190)
一 机构成立	(190)
二 注音汉字	(191)
三 《中华新韵》和“全国方音注音符号”	(200)
四 《国语辞典》	(209)
第二节 国立编译馆(下)	(214)
一 20 世纪 40 年代人文社会科学名词的编纂状况	(214)
二 评 述	(216)
第三节 拉丁化新文字和大众语运动	(219)
一 拉丁化新文字	(220)
二 大众语运动	(230)
三 评 述	(232)

第七章 余论

第一节 民国时期语言政策研究的双重关系和三层结构	(241)
一 以权威机构为主线的语言内容、社会功能双重关系	(241)
二 以语言学理为依据的语音文字、术语新词和语体 三层结构	(242)
第二节 黎锦熙国语运动思想与豪根语言规划定义的 对比研究	(243)
一 “最终标准官方机构语言”vs. “国语” ——相似之点	(245)
二 “语言规划四重模型”vs. “国语新文字论” ——不同之处	(248)
三 评 述	(251)

附 录 民国时期主要语言政策文件目录	(253)
主要参考文献	(256)
后 记	(263)

第一章

绪 论

正如语言伴随人类的成长与发展，人类对自身语言有意识的改变，也伴随人类由蒙昧自由的远古时期行至繁荣拥挤的 21 世纪。作为语言历史悠远漫长、语言状况丰富多变的东方国家，中国对于自身语言有意识的整理、总结和改革几乎与其文化传统相始终，从上古时期孔子推行“雅言”，到中古时期的“正音”运动、《中原音韵》和正音书院，再到近代时期的切音字运动，对于汉语使用的历次整理、总结和改革无一例外地，从语言的角度记录了各个历史阶段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发展至近代，传统帝国面临进入现代国家的剧烈动荡，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中央与地方，种种冲突不断冲击，社会思潮、政治革命乃至民族战争更迭发生，语言作为人类历史的忠实记录者必然以独特的方式一一加以反映。自清末至民国的历次语言历史事件，由“切音字运动”、“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至“大众语运动”、“拉丁化新文字”等，从语言的角度彰显了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过渡的历史进程；同时，由于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以及现代国家的建立，人类对于自身语言有意识的改变，开始作为一门学科日渐受到国家管理者、语言使用者和学术研究者的关注，20 世纪上半叶，“语文运动”、“文字改革”和“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等概念分别在中国和西方的学术界浮出水面，进入语言管理者和研究者的视野。

第一节 “语文运动”和“文字改革”vs. “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对于民国时期^①乃至后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中国语文研究者和工作者来说,提及“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这两个术语必然会和“语文运动”、“文字改革”这两个概念相比较。

一 “语文运动”和“文字改革”

“语文运动”一词频繁使用于清末民国时期运动蜂起的社会文化思潮,“切音字运动”、“国语运动”、“大众语运动”等语言事件真实反映了民国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层面的语言状况,因此“语文运动”这一概念自产生之时起即兼具语言性和社会性双重含义,且在其社会层面中更倾向于强调社会多层面的共同参与,黎锦熙^②在其1935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国语运动史纲》中有一段关于“运动”的解释可以佐证:

大凡一种“运动”,总是起于少数先知先觉者一种有意的宣传,跟着社会上一般人士受其影响而相与追随,跟着政府也就受其影响而起了反应。我们根据这个运动历程,可以把三十多年以来的“国语运动”划分为四个时期,每一个时期,就拿政府对于这种运动反应的事实作一个纲领。(《国语运动史纲》,第2页)

“语文生活”一词可以视为“语文运动”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周有光关于“语文生活”的解说明确了该概念中群众、学者和政府各层共

① 若无特别提示,本书的“民国时期”起止时间为1912年至1949年。

② 黎锦熙(1890—1978),字君缉,号劭西,别号鹏庵,湖南湘潭人。1911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1915年应教育部之聘任教科书特约编纂员。1920年开始在高等学校任教,曾任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中华国语研究会、“国语统一筹备会”、“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数人会”会员,“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1949年以后,参与研究、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等工作。

同参与的社会性。

语文生活的前进动力来自三个方面：1. 群众的语文运动；2. 学者的语文研究；3. 政府的语文政策。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语文运动就没有活力，没有语文研究就不能提高，没有语文政策就难于推行。（《信息化时代和中国语文现代化》，载《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第25页）

“文字改革”这一概念始于五四时期，最初限于字面意义的汉字层面，新中国成立后逐渐扩大至整个语言层面，进入新时期之后则使用渐少。虽然鉴于学理的、历史的种种局限性，“文字改革”这一概念在当前的语言政策研究中日渐式微，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时间内语言政策的强力行政推行和深远社会影响均与该概念相联系，使其几乎成为当代中国语言政策研究不可回避的母题。“文字改革”这一概念涉及整个语言层面是否符合语言学学理姑且不论，就本书的研究内容而言，其强调行政推行的社会性与“语文运动”、“语文生活”等概念也颇有差异之处，前者强调社会含义中的政府行为，后者则倾向于将民间活动与官方措施并举。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学者开始使用“汉字改革”或者“文字改革”这个术语，主要指的是废弃汉字改用拼音文字。20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文字改革”的内涵有所调整。当时确定的语文改革分为两步走的设想是：最终目标是实现拼音化，采用拼音文字；当前的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当代中国的语文改革和语文规范》，第14页）

二 “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语言政策”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术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语言规划”一词被同时使用，且在“语言规划”研究的高潮时期，“语言政策”曾经一度淡出该领域研究者的视野。最近一二十年以来，“语言规划”由于其理论体系日益庞杂而受到一些质疑，“语

言政策”的概念又重新受到学界的重视,当然这并不妨碍“语言规划”的已有成果仍然作为“语言政策”的核心理论成分而存在。

先论“语言规划”。

20世纪50年代末,社会语言学开始在西方学术界兴起,在“标准语(standardized languages)”^①、“双语体(diglossia)”^②等研究出现的同时,有关“语言规划”的概念开始在一些欧洲学者的研究中浮出水面。1959年,爱纳·英格瓦德·豪根(Einar Ingvald Haugen^③)正式在文献中介绍语言规划这一概念。然而,早期的提法却并非是语言规划,而是一组与语言规划类似的相关概念。

在文献中出现的第一个术语并非是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可能是语言工程(language engineering)(米勒(Miller),1950),但“语言规划”这一术语却较语言政治(glottopolitics)(霍尔(Hall),1951)、语言发展(language development)(诺斯(Noss),1967)或者语言调节(language regulation)(高曼(Gorman),1973)更为常用。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有时作为语言规划的同义词出现,但是前者似乎更倾向于表示语言规划的目标。(古柏(Cooper),29页)^④

1966年,美国召开“语言问题大会”(Conference of Language Problems)专门讨论与语言规划相关的社会语言学问题,1968年至1969年,斯坦福大学“语言规划过程”(Language Planning Processes)研究项目提出了语言规划的理论框架并出版论文集《语言是可以规划的吗?》(*Can Language Be Planned?*),语言规划进入了有组织的系统研究时期。纵观整

① Heinz Kloss, *Die Entwicklung neuer germanischer Kultursprachen von*, 1952.

② Charles A. Ferguson, *Diglossia*, 1959.

③ Einar Ingvald Haugen (1906—1994), 美国语言学家, 历任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教授、哈佛大学教授, 研究领域为社会语言学、挪威语—美语研究以及古诺斯语研究, 代表著作有: *A study in bilingual behavior* (1956), *The Norwegian language in America* (1969),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1972) 等。

④ Robert L. Cooper,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1989.

个 20 世纪,从研究方法的更迭发展以及与其他学科交叉关系的角度,豪根、古柏以及罗伯特·B.卡普兰(Robert B. Kaplan)和理查德·B.巴尔道夫(Richard B. Baldauf Jr.)的定义值得我们注意。

豪根的定义(1959, 1966, 1969)。1959年,豪根提出语言规划“是一种在非单一言语共同体中,为指导写作和言谈而制定规范的拼写法、语法和词典的行为”。^① 1966年,豪根又对该定义进行了修正,认为此前提出的其实是语言规划的结果,即为语言规划者做出决定的一个实施部分,而不是语言规划的全部。^② 1969年,豪根再次提出“我所定义的 LP,包括以语言改革和标准化为目的的语言学院和委员会的规范工作以及一般所说的各种语言培养(Language cultivation)”。^③ 作为语言规划研究的开拓者,豪根从现代挪威标准语的研究出发,从语言规划的结果(1959年的定义),到语言规划的执行者和实施(1966年的定义),以至语言规划的整个过程(1969年的定义),逐步形成了自身的语言规划概念,其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均对此后的语言规划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柏的定义(1989)。在《语言规划和社会变化》(1989)一书中,古柏认为当时的语言规划理论尚处于发现语言行为规律的阶段,即处于形成语言规划理论的初期,因此一个描述性的框架(即哪些变量对于描写语言规划是最有用的)对于当时的语言规划研究是有必要的,因此他在总结了前人的定义之后提出:“语言规划是指有意识地影响他人的与语言习得、结构和功能分配相关的语言行为。”^④

卡普兰和巴尔道夫的定义(1997)。在 1997 年的理论长著中,卡普兰和巴尔道夫将语言规划定义为在一个或多个群体中,以实现语言有计划的改变(或组织已发生的变化)为目的的一系列观点、法律和规定(语

① Einar Haugen. *Planning for a standard language in modern Norway*,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 (3): 8-21, 1959.

② Einar Hauge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planning*. In William Bright (Ed.), *Sociolinguistics: proceedings of the UCLA Sociolinguistics Conference*, 1964. The Hague: Mouton, pp. 50-71. 1966.

③ Einar Haugen. *Language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 Graur (Ed.), *Acts du Xe Congres International des Linguistes*; Bucarest, 28 Aout - 2Septembre, 1967. Bucarest: Editions de L'Academie de la Republique Socialiste de Roumanie. Vol. 1, pp. 701-711. 1969.

④ Robert L. Cooper.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1989, p. 59.

言政策)以及变革规则、信仰和实践。^①卡普兰和巴尔道夫认为语言规划研究存在忽视语言社团中多种语言的相互关系和多种非语言因素的倾向,主张在语言环境的总体生态(total ecology)中进行语言规划的研究,这一观点很显然是对豪根在70年代提出的语言生态观的继承,^②虽然后者提出该观点时并没有涉及语言规划。

语言规划概念自诞生之日起便定义更迭、流派纷呈,四十多年的研究历程中出现了三十多种定义,既体现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巨大活力,同时也给这一学科的研究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困扰。首先,语言规划作为社会语言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定义的产生、发展和流变与社会语言学的总体发展息息相关,其理论基点和研究方法受到社会语言学研究进展的深刻影响。众所周知,20世纪后半期,社会语言学是语言学科、社会学科乃至整个人文学科中极为活跃的研究领域,核心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让人慨叹,而作为其学科边缘而存在的语言规划研究自然更是当仁不让^③。其次,社会语言学作为语言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语言规划更是社会语言学中涉及语言学之外因素更多的部分,从豪根至卡普兰和巴尔道夫的定义可以清晰地看出,语言规划的定义逐渐从语言学向社会学、人类学和生态学等多学科扩展,从一种语言向多种语言乃至整个语言环境扩展,语言规划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伴随着20世纪后半期西方人文学科中显学的发展更替而不断更迭,始终坚持了西方学术界的前沿阵地和主流方向^④。然而,多

① Robert B. Kaplan, Richard B. Baldauf Jr.,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7.

②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Anwar S. Dil.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ssays by Einar Haugen*.

③ 豪根的定义、卡普兰和巴尔道夫的定义分别诞生于“双语体”和“语言生态学”(the ecology of language)这两种重要的社会语言学理论,前者是美国语言学家弗格森于1959提出的重要社会语言学理论,分析了同一言语社团两种或多种语言变体并存的状况,该理论催生了豪根的相关语言规划定义;后者则是豪根在1970年提出的社会语言学理论,将生态人类学的观点引入语言学,强调研究和分析既定语言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生存环境,该理论是卡普兰和巴尔道夫定义的理论出发点。

④ 刘海涛结合雷森德(Ricento)的研究对其列举的数十种定义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在此,我们列出显现语言规划领域这种转变的一些具体特征:从工具观到资源观的转变;从结构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变;从单变量系统到多变量系统的转变;从实用主义到语言人权的转变;从语言问题到语言生态的转变;从单纯的语言学领域向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转变”。(刘海涛,2006)